



## 府城竹溪寺創建年代之考察\*

釋自憲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 摘要

對於臺灣最早期所建立的佛寺，學者大多採用盧嘉興的研究成果，以竹溪寺、彌陀寺及龍湖巖為是；有人更因而以探察前二寺的創建年代作為佛教傳入臺灣的判定依據。

然有關竹溪寺開山的年代，至今仍被爭議著。除了晚期的史料都認為其建於清領時期外，盧嘉興更在盛成的研究基礎上，同樣依據臺灣文獻始祖——沈光文的詩句而推斷出竹溪寺興建於明鄭時期，並且是全臺首座的佛刹。但楊惠南針對盧嘉興判定竹溪寺創建年代的論點，重新加以考察，認為其中有許多可再商榷之處，而且有些關鍵性的論點甚至不足以成立。如果楊惠南的研究成果是合理的，那麼，多少會影響近半世紀以來關於臺灣佛教史的研究。於此，筆者認為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

本論文，首先回顧史料文獻中關於竹溪寺的記載，試圖從中再度掘發其創建的年代。其次，分別探究、檢討盛成與盧嘉興的觀點，並旁及楊惠南的論證。

---

\* 本文之寫作，惠承玄奘大學宗教學系主任釋昭慧教授鼓勵與指導，又承慧璉法師協助日本文獻的翻譯與賜正；後於研討會場上更承蒙釋慧嚴教授悉心指正，謹此敬申謝忱。



在——考察了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後，本文初步得到的結論是：竹溪寺乃創建於明鄭時期，而且就在永曆 18 年改制後的鄭經主臺初期之可能性很高，並不是如較晚的史料所記與楊惠南所判定的，歸屬隸清以後所建之寺院。至於其是否為全臺首座的佛剎，則留待日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關鍵詞：**竹溪寺、彌陀寺、法華寺、沈光文、〈酬唱詩〉



## 一、前言

臺南一地，於康熙 23 年（1684）首置臺灣府，<sup>1</sup>始稱「臺灣府城」或簡稱「府城」。故本文所用「府城」一詞，即指今之臺南市；竹溪寺乃位於市的南區。

20 世紀末，研究臺灣佛教的學者大多採用盧嘉興的研究成果，以臺南府城的竹溪寺、彌陀寺及位於今烏山頭珊瑚潭的龍湖巖（按：閩人謂寺為巖）等為臺灣早期建立的佛寺，更以此作為佛教傳入臺灣的探察對象，而且也認同這三座古剎中以竹溪寺為最早，是臺灣的第一座佛寺。

這三座佛寺中，臺灣各府志與縣志對於龍湖巖的記載，都一致且明確地指出它是明鄭時期，由鄭經王朝的大臣—諮議參軍陳永華所建，雖沒有明說確切的年代，但把它歸屬臺灣早期的佛寺，可說是沒有爭議的。

竹溪寺與彌陀寺就不一樣了。在早期的臺灣文獻史料中，確實提到了竹溪寺與彌陀室（即今彌陀寺），但從未記明二寺的創建年代與因緣。如：康熙 33 年（1694）高拱乾編纂的《臺灣府志》（以下簡稱《高纂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載：「竹溪寺：在府治東南數里許，其間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最為勝景……。彌陀室：在附郭之東，庭宇幽靜，佛像莊嚴……」。到了康熙 59 年（1720），由王禮主修，陳文達等編纂的《臺灣縣志》（以下簡稱《王纂縣志》），其卷 9〈雜記誌·寺廟〉載：「彌陀寺：邑東郊外也，年久傾圮，僧徒散去，……。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茂，溪流環拱，竹木花果，堪稱勝致，匾其山門曰：『小西天』」。乃至刊行於乾隆 12 年（1747）的《重修臺灣府志》卷 19

<sup>1</sup> 蔣毓英（清），《臺灣府志》卷 6〈規制·衙署〉，頁 204。



〈雜記·寺廟〉載：「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幽，清溪環拱……。彌陀寺：在東門內永康里。年久傾圮；康熙五十八年僧一峰至自武彝募化重興……」。

以上，自康熙 33 年至乾隆 12 年所纂的早期史料，雖都提到了竹溪寺與彌陀室（即今彌陀寺），但未記明二寺的創建年代與因緣。直到乾隆 17 年以後，較晚修撰的志書，則陸續明說二寺的創建年代，如：乾隆 17 年（1752）刊行的《重修臺灣縣志》卷 6〈寺宇〉載：「竹溪寺：在永康里，康熙三十二年建，顏曰小西天……。彌陀寺：在大東門內永康里，偽時建，歲久傾圮……」。其次，道光 22 年（1842）所發行的《清一統志臺灣府》〈寺觀〉載：「竹溪寺：在臺灣縣治東南二里，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建……」（此志無彌陀寺之記）。又，大正 5 年（1916）所出版的《臺灣名勝舊蹟志》則說：「竹溪寺：係清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彌陀寺：係鄭成功之子經，以本島沒有一名刹為憾，為奉佛祈福，創建的所在」。而完稿於大正 7 年（1918）的《臺灣通史》〈宗教志〉說：「彌陀寺：當是時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竹溪寺：在大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一致認為：竹溪寺是創建於清領之後的康熙年間，而彌陀寺則是明鄭時期所建。

事實上，志書所記載的內容，有可能會因年代越晚，記載增補越多，卻無來源的說明，而影響其可信度。以彌陀寺的興建年代與因緣來說，經由盧嘉興幾番精密的考證，曾針對該寺撰寫了兩篇研究文獻——〈臺南古刹彌陀寺〉<sup>2</sup>與〈再談臺南古刹彌陀寺〉<sup>3</sup>而有所新發現，尤其是後文，更依據寺中的總錄牌位考究出清領時期第 1 任知府蔣毓英（康熙 23 至 28 年）來臺任職期間，曾修葺再興彌陀

<sup>2</sup> 盧嘉興 1979a，頁 255-267。

<sup>3</sup> 盧嘉興 1971，頁 38-40。



寺的史料，<sup>4</sup>這也證實了彌陀寺是創建於明鄭時代。不過，檢視蔣毓英所纂修的《臺灣府志》（以下簡稱《蔣纂府志》），書中不僅未提及彌陀寺，也未記載修葺彌陀寺之事。故筆者對牌位上的記載與盧嘉興的觀點存疑。

另外，彌陀寺的創建者是信士洪元弼，<sup>5</sup>並非延平王鄭經。該寺總錄牌位上寫著：「開建本室信官洪諱元弼檀樾主星君」，此與嘉慶 10 年（1805）的「重建彌陀寺碑記」所載：「考昔檀樾洪公，佈施捐造，歷今百有餘年……」<sup>6</sup>意同。若當時的彌陀寺真如《臺灣通史》所說，是「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那必定是「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猶為郡中古刹。」加上東安坊是入清後臺灣府的府治所在，彌陀寺理應會被《蔣纂府志》所收錄。但事實並不如此。

又，上述「碑記」說洪公佈施捐造彌陀寺以來，距嘉慶 10 年的重建已百有餘年，若以此推算起來，時間約為 17 世紀末，最早也應是蔣毓英修纂《府志》完稿（康熙 25 年，西元 1686 年）<sup>7</sup>之後了。倘若如此，則康熙 33 年的《臺灣府志》也應會記明彌陀室之創建年代才是，但該《府志》中卻只有寺名而無建年之記。據此，可推知彌陀室應是建於明鄭時期，只不過因年久頹圯，規模又小，故未被《蔣纂府志》所收錄。而且，也可能因規模較一般寺院小的緣故，康熙 33 年與 51 年的《府志》中，稱其為「彌陀室」而不稱

<sup>4</sup> 牌位上寫著：重興本室按察副使道管臺灣府事檀樾主蔣公諱毓英星君。見盧嘉興 1971，頁 38。

<sup>5</sup> 見盧嘉興 1971，頁 38。

<sup>6</sup> 見杉山靖憲 1916，頁 151；又，黃典權 1977，頁 182。

<sup>7</sup> 由臺灣第 1 任知府蔣毓英所纂修之《臺灣府志》，初稿完成於康熙 25 年 1、2 月間，臺廈道周昌又為之參覆審定，而定稿於 25 年 5 月以後並送呈。今日所見之刊本，據刊本卷 8「官制·水師官制」項下載有「澎湖水師協標左營守備趙廣」一條，趙廣為康熙 27 年任官，可知《蔣志》必刊行於 27 年後。見蔣毓英 2004，頁 113-114。



「寺」。<sup>8</sup>等到該寺於 58 年經重建擴充後已具規模，59 年所修的《臺灣縣志》中，才改稱「彌陀寺」迄今。<sup>9</sup>

由此可知，日據時代由臺灣總督府調查編輯的《臺灣名勝舊蹟誌》所記：「彌陀寺：係鄭成功之子經，以本島沒有一名刹為憾，為奉佛祈福，創建的所在。」<sup>10</sup>及隨後所印行的《通史》說：「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猶為郡中古刹。」<sup>11</sup>以致影響後人而有「此是佛教寺院之嚆矢」說等，<sup>12</sup>之其中的可靠性，已被新的論證結果所推翻。

古刹彌陀寺興建的時代，若依目前學界考證的結果來看，確為臺灣早期的寺院之一，而竹溪寺呢？有關竹溪寺開山的年代，至今仍有爭議。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軸。在早期的志書未記明創建年代，而晚期的史料又都認為建於清領時期的情況下，盧嘉興依據臺灣文獻始祖—沈光文的詩句來研判竹溪寺的創建年代，其不僅推斷出竹溪寺興建於明鄭時期，而且是全臺首座的佛刹。該研究成果也獲得學界的認同與引用。<sup>13</sup>

直至 21 世紀初，楊惠南針對盧嘉興判定竹溪寺創建年代的論點，重新加以考察，認為其中有許多可再商榷之處，而且有些關鍵性的論點甚至不足以成立。如果楊惠南的研究成果是合理的，那

<sup>8</sup> 高拱乾 1983，頁 216；及周元文 1983，頁 280。

<sup>9</sup> 王禮 1983，頁 207。

<sup>10</sup> 杉山靖憲 1916，頁 150。原文：鄭成功の子、經が本島に一の名刹なきを憾とし、奉佛祈福のため創建せし所なり。

<sup>11</sup> 連雅堂 1985，頁 551。

<sup>12</sup> 林熊祥主修、李添春纂修 1956，頁 68。

<sup>13</sup> 盧文具有重大影響力，其後如趙恒惕《臺灣佛教名刹》（後部），1988，頁 262；闕正宗《臺灣佛寺導遊》（9），頁 57；《臺灣佛教一百年》，1999，頁 241；及釋慧嚴《臺灣佛教史前期》，頁 280-285，等等，都依照盧文，判定竹溪寺是臺灣第 1 座佛寺。



麼，多少會影響近半世紀以來關於臺灣佛教史的研究。於此，筆者認為有進一步探究的必要。不過，限於篇幅與時間因素的考量，本文僅著重在竹溪寺創建年代的重新考察。首先，先仔細回顧史料文獻中關於竹溪寺的記載。

## 二、史料文獻對於竹溪寺的記載

一般認為，臺灣最早的志書，是清領之後（康熙 33 年，西元 1694 年）由第 3 任的臺廈道高拱乾所纂成的《臺灣府志》。目前流通於臺灣的《高纂府志》，是民國 44 年臺灣大學教授方豪，託由日本友人向日本內閣文庫洽商攝影，獨資重印而來。<sup>14</sup>但實際上，在《高纂府志》之前還有更早的方志，即前揭之《蔣纂府志》，該志初稿完成於康熙 25 年。而且，透過內容的比對，發現《高纂府志》乃承襲《蔣纂府志》而來。<sup>15</sup>

檢閱《蔣纂府志》所記，當時府城的廟宇和古蹟中，皆未見有佛寺的記載，只有鎮北坊的觀音廟：「前後座泥金色相，左右塑十八羅漢，俗呼為觀音亭。」<sup>16</sup>但已有記載府城之外，位於諸羅縣開化里之龍湖巖：「偽總制陳永華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sup>17</sup>令人不解的是，擴及整部《府志》其它的項類的搜尋，仍未見今之開元寺（昔海會寺）與法華寺（昔準提庵）的前身，即分別

<sup>14</sup> 盧嘉興 1977a，頁 7。

<sup>15</sup> 從《高纂府志》的「凡例」中，可知其修志之前，本已存有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草稿」、季麒光的「臺灣郡志稿」，此二書隨著《高志》出版後，似乎也逐漸湮沒無聞，以致臺灣早年均未見有傳世之本。直到廈門大學陳碧笙取得上海圖書館珍藏的海內孤本，與李秉乾、李祖基三人，於 1984 年共同點校出版《臺灣府志校注》，則《蔣志》一書才得再度見於世人。參見陳碧笙 1985（前言），頁 3-5。轉引自蔣毓英 2004，頁 111-112。

<sup>16</sup> 《蔣纂府志》〈廟宇〉，頁 208。

<sup>17</sup> 同上註。



由鄭經所建的鄭氏別館與明末舉人所築的夢蝶園<sup>18</sup>之記載。若從隨後陸續刊行的《府志》、《縣志》等都記載明鄭時期就已存在鄭氏別館與夢蝶園的這個事實來看，那麼，最早的《蔣纂府志》所記的內容顯然是有缺漏的。由此可知，未被載入《府志》中的，未必表示就不存在。鄭氏別館與夢蝶園如此，或許竹溪寺也可能是這樣。以下，就依時序來看竹溪寺在史料中的相關記載。

《高纂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載：「竹溪寺：在府治東南數里許，其間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最為勝景。良辰佳節，騷客遊人多會於此。」<sup>19</sup>同文亦記載於《重修臺灣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中。<sup>20</sup>此志書是康熙 51 年（1712），第 5 任臺灣府知府周元文所纂修（簡稱《周纂府志》），刊行於 57 年以後。

康熙 59 年（1720），第 7 任海防同知兼攝臺灣縣事王禮主修，歲貢生陳文達、林中桂，生員李欽文等編纂的《臺灣縣志》，是臺灣舊縣志最早的刊本。<sup>21</sup>此志卷 9〈雜記志·寺廟〉載：「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茂，溪流環拱，竹木花果，堪稱勝致，匾其山門曰：『小西天』」。<sup>22</sup>又，刊行於乾隆 12 年（1747），由臺灣府巡視臺灣兼提督學政監察御史范咸主修的《重修臺灣府志》（簡稱《范纂府志》），其卷 19〈雜記·寺廟〉載：「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幽，清溪環拱，竹木花果，頗稱勝概，顏其山門曰：『小

<sup>18</sup> 《蔣纂府志》中雖無「夢蝶園」條，但在「李茂春列傳」中有「構一禪宇，匾曰『夢蝶處』；與住僧禮誦經文為娛，自號『李菩薩』。」之記。見蔣毓英 2004，頁 254。

<sup>19</sup> 高拱乾 1983，頁 216。

<sup>20</sup> 周元文 1983，頁 280。

<sup>21</sup> 現在的流通本，是民國 46 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訪組長陳漢光，向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影取得，並由文獻會影印重刊於世。見盧嘉興 1977a，頁 8。

<sup>22</sup> 王禮 1983，頁 208。





西天』。寺田在尖山莊一十二甲，年收租粟為香火。」<sup>23</sup>同文亦記載於乾隆 39 年刊行，為臺灣府知府余文儀主修的《續修臺灣府志》中。<sup>24</sup>

由以上早期的史料所記，只敘述竹溪寺所在位置及周邊環境，乃至經濟來源等，尤其景致之勝，猶如佛國淨土，故「匾其山門曰：『小西天』」；皆未說明開山建寺的年代及其因緣。然而，此後所修的志書，則開始出現創建年代的記載。如，乾隆 17 年（1752）刊行，由王必昌主修的《重修臺灣縣志》（簡稱《王纂縣志》）載：「竹溪寺：在永康里，康熙三十二年建，顏曰：『小西天』。徑曲境幽，清溪環抱，有林木花果之勝，香燈田坐尖山莊，計一十二甲。」<sup>25</sup>

其次，初成於乾隆 8 年，續成於乾隆 49 年，再重纂至嘉慶 25 年，於道光 22 年（1842）所發行的《清一統志臺灣府·寺觀》載：「竹溪寺：在臺灣縣治東南二里，本朝康熙二十二年建，林木蒼鬱，溪澗紆迴，遊人多集於此；董天工見聞錄，寺旁門榜曰：『小西天』」。<sup>26</sup>又，大正 5 年（1916）臺灣總督府所出版的《臺灣名勝舊蹟志》中，則說竹溪寺：「寺距今凡二百三十年，係清康熙二十年代〔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sup>27</sup>而大正 7 年（1918）完稿，8 年出版之《臺灣通史》中，<sup>28</sup>連雅堂卻說：「竹

<sup>23</sup> 范咸 2005，頁 710。

<sup>24</sup> 余文儀 2007，頁 847。

<sup>25</sup> 王必昌 2005，頁 289。

<sup>26</sup> 穆彰阿 2007，頁 76。

<sup>27</sup> 見杉山靖憲 1916，頁 139。原文：寺は今を去ること凡そ二百三十年、清の康熙二十年代〔二十三年ふり二十八年の間〕臺灣府知府蔣毓英の建つる所なり。按：〔二十三年ふり二十八年の間〕，依其意為〔23 年起至 28 年間〕來看，則句中的「ふり」應為「より」之筆誤。此一發現乃由釋慧嚴教授在研討會上所作的指正。

<sup>28</sup> 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楊雲萍教授為《臺灣通史》的重刊新版寫序時說：「《通史》有其可議論處，如史料不完備。《府志》類，僅《余志》。各



溪寺：在大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徑曲林幽，清溪環拱，頗稱勝概，顏其山門曰：『小西天』。<sup>29</sup>

較晚的志書雖都提到了竹溪寺的創建年代，但說法並不一致。康熙 22 年（1683）8 月，鄭成功的裔孫鄭克塽降清，臺灣亦從此進入清朝統治的階段，若竹溪寺就建立於此時；或者是在隔年上任的臺灣知府蔣毓英任內（23 年起至 28 年間）所建，那麼，當蔣毓英於康熙 25 年修纂《府志》時，應會被收錄；但《蔣纂府志》中不僅尚無竹溪寺的記載，更何況其年代。因此，《清一統志臺灣府》與《臺灣名勝舊蹟志》的說法是令人懷疑的。

其次，若竹溪寺為康熙 30 年或康熙 32 年所興建，則也應被明記於康熙 33 年所編纂的《臺灣府志》中，但事實並不如此。而且，甚至連康熙 59 年所纂修的《臺灣縣志》也沒有提及竹溪寺所建的年代。是故，《臺灣通史》和《王纂府志》的說法也是可疑的。

那麼，為何晚期的史料會如此的認為竹溪寺是創建於清領初期，而年代又各不相同呢？這是很令人疑惑不解的。筆者認為，很有可能原因是臺灣最早的《府志》（康熙 25 年及 33 年纂）與《縣志》（康熙 59 年纂）當時已失傳，<sup>30</sup>無所依憑，致使後來的修纂者各依所聞而推定之故。例如「康熙 32 年」與竹溪寺之間確實曾有關係。

種檔案，以及日、荷原始文件多付缺如。」引見連雅堂 1985，頁 1。

<sup>29</sup> 連雅堂 1985，頁 561。

<sup>30</sup> 如註 15 所言：《高纂府志》之前，已存有蔣毓英的「臺灣府志草稿」、季麒光的「臺灣郡志稿」，此二書隨著《高志》出版後，似乎也逐漸湮沒無聞，以致臺灣早年均未見有傳世之本。直到 73 年由陳碧笙等共同點校出版《臺灣府志校注》後，《蔣志》一書才得再度見於世人。又，本文頁 4 言：《高纂府志》失傳已久，目前流通於台灣的本，是民國 44 年台灣大學教授方豪，託由日本友人向日本內閣文庫洽商攝影，獨資重印而來。及註 19 言：《臺灣縣志》也已失傳很久，今之流通本則是民國 46 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採訪組長陳漢光向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影取得，並由文獻會影印重刊於世。



據康熙 33 年纂的《臺灣府志》記：「竹溪書院：為郡首吳國柱建，尚像祀焉。守惠政在人，士庶輦石輸材，諭禁不能止，康熙三十二年建。」<sup>31</sup>依此，盧嘉興解釋說：清初書院多利用寺院附建。<sup>32</sup>因為當時府城地區另置有「彌陀室書院」，按其名推知，書院應附建於彌陀室（即今彌陀寺），因此「竹溪書院」可能也比照此模式建立，由當時臺灣第 2 任的知府吳國柱<sup>33</sup>附建於竹溪寺，吳知府惠政於民，所以他建書院的時候，不分特殊階級及寒門庶民，均自願運石搬材。雖經諭禁也是無效。康熙 32 年落成，此時吳知府已榮遷，所以臺民為之塑像祭祀以資紀念，至今仍奉祀在竹溪寺內，<sup>34</sup>也正呼應了「尚像祀焉」之記載。因此，康熙 32 年所建的應是竹溪書院，而不是如《王纂府志》所記：「竹溪寺，康熙三十二年建」。

竹溪寺的寺名最早見於現存可徵的康熙 33 年之《臺灣府志》與康熙 59 年之《臺灣縣志》中，然從其未記明創建年代的事實來看，主張竹溪寺建於康熙 32 年，或是康熙 30 年（《通史》），乃至康熙 22 年（《一統志》）或是康熙 23 年起至 28 年間（《臺灣名勝舊蹟志》）等等說法，由於缺乏其他相關文獻、事蹟或文物之佐證，因此都顯得很牽強，在理上也難以說得通。

以上，是透過志書對於竹溪寺的記錄，來試圖掘發其創建年代。除此之外，還有一條可以用來考察竹溪寺創建年代的線索，那就是各《府志》、《縣志》所一致提示的：竹溪寺寺院所在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景色幽美，每逢良辰佳節，必有文人騷客觸景而興，留下許多詩詞。因此，研究這些文人騷客所留下的詩詞，或許

<sup>31</sup> 高拱乾 1983，頁 33。

<sup>32</sup> 盧嘉興 1977a，頁 10。

<sup>33</sup> 吳國柱，遼東人，廕監生，康熙 29 年任，茹水三載，秩滿陞江西贛南道。見高拱乾 1983，頁 58。

<sup>34</sup> 經盧嘉興小心求證的結果，竹溪寺所奉祀的塑像應該是「臺灣知府吳國柱塑像」，而非後人所誤以為的臺灣第 1 任知府蔣毓英。詳見盧嘉興 1977a，頁 10。



可以從中找出一些端倪，進而解開寺院創建年代之謎。

最早依據詩文來研究竹溪寺築建年代的當屬盛成。之後，盧嘉興亦在盛成的研究成果上作進一步的求證。因此，在探討盧嘉興的論點之前，應先了解並考察盛成的所作的推論及其結果。

### 三、盛成<sup>35</sup>的論點

明末遺臣沈光文（1612-1688），他的大半生可以說是在臺灣渡過，對臺灣的風土鄉情有感觸，撰了〈臺灣賦〉流傳於世。<sup>36</sup>在他所吟詠的詩詞中，有一則與鄭氏官吏唱酬之詩，題為「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作，盛成研撰〈沈光文研究〉時，曾依沈光文的生平分析此〈酬唱詩〉的內容與意涵，認為此詩與竹溪寺有密切的關係，<sup>37</sup>並從中推論出竹溪寺建立的年代。詩云：「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頑。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sup>38</sup>

盛成對詩中所言「十年作客幾能閒」的見解是：「公（光文）

<sup>35</sup> 盛成（1899-1996），名延禧，字成中，江蘇儀徵人，享年 97 歲。是 20 世紀，中國一位集作家、詩人、翻譯家、語言學家、漢學家於一身的國際著名的學者。他蜚居臺島期間（1947-1964），曾潛心鑽研明史，寫出了一系列論文，發表過「沈光文研究」國學系列（1954），並完成了《沈光文研究》專書。資料來源：1.盛成—Hudong 互動百科。2.「儀徵風情」網站。

<sup>36</sup> 沈光文乃鄭氏王朝有名的文人。蔣毓英《臺灣府志》，曾為他立了一個小傳：沈光文，字文開，別號斯菴，浙之鄞縣人。……買舟欲入泉州，過圍頭洋，遇颶風，飄泊至臺，不能返棹，遂寓居焉。及鄭大木（成功）掠有其地，斯菴以客禮相見。鄭經嗣爵，多所變更，斯菴知經無能為，且以一賦寓譏諷，為忌者所中，幾死於經，乃改服為僧，入山不出，於目加溜灣番社傍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所著文有〈臺灣賦〉、〈檣賦〉、〈草木雜記〉等。引見：蔣毓英 2004，頁 254。

<sup>37</sup> 盛成認為詩題所說「南溪」即「臺南之城南竹溪」，「新構之僧舍」即「後世之竹溪寺」。見盧嘉興 1977a，頁 9。

<sup>38</sup> 龔顯宗主編 1998，頁 20-21。



自壬辰，永曆六年，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來臺，至此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二年，恰巧十年。（這十年來）因生活奔走，無暇幫閒耳。」<sup>39</sup>此語不僅意指這首詩作於永曆 15 年（1662），同時也意味著竹溪寺在更早之前就已建立。

不過，楊惠南卻認為，詩中的「十年」，不必一定恰為 10 年，也有可能是 9 年、11 年或 12 年。<sup>40</sup>筆者也頗為認同。是故詩中所說的「十年」，不一定正好是 10 年。縱使恰好 10 年，但由於沈光文入臺年代，向來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至今仍是疑雲重重。因此，在沒有確定沈光文來臺的確切時間之前，沈光文〈酬唱詩〉「十年作客幾能閒」一句當中的「十年」，是否真像盛成所說的那樣，恰為永曆 5 至 15 年，實有進一步商榷的餘地。<sup>41</sup>

其實，盛成會這麼解釋，筆者以為自有他的道理。他在文中引用《臺灣文化志》所載而說「成功平臺之後，設承天府，下設二州；天興州與萬年州」，<sup>42</sup>意指「州」的設立是在鄭成功（1624-1662）的時代（即永曆 15 年）。但事實上，《文化志》對於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州，並沒有說明確切的年代。<sup>43</sup>而盛成引用時卻以為「改縣為州」是在鄭成功的時代。或許，這樣說也才符合詩題所謂的「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吧！但令人不解的是，盛成又說：

<sup>39</sup> 轉引自盧嘉興 1977a，頁 9。

<sup>40</sup> 楊惠南 2002a，頁 105-106。

<sup>41</sup> 楊惠南 2002a，頁 106-108。

<sup>42</sup> 轉引自盧嘉興 1977a，頁 9。

<sup>43</sup> 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下卷，第 14 篇拓殖沿革第 1 章，頁 274。原文是：父子三世二十二年（自明永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至永曆三十七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之間），就南部和蘭人的遺址建承天府，設安平鎮，別於北路置天興，南路置萬年各縣（後陞為州），立鎮開屯。同時招徠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的流民，大闢草萊。轉引自釋慧嚴 1995，頁 283-284。



竹溪寺相傳為鄭省英建（府志），省英為芝莞長子，於永曆十五年十二月（一六六二年二月）繼楊朝棟為承天府尹。天興州守為莊文烈，永曆十五年五月任，萬年州守為祝敬，同時任。……祝敬為首任萬年知州。是年十二月初六日（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與朝棟以小斗散糧，剋扣軍旅為成功所殺。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已是西元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時荷蘭已降。成功先於是時在附城置第宅，寺之構成，當亦於是時。當時光文恐已知成功將殺北人楊朝棟與祝敬，故云「人多往遊，余未及也」。<sup>44</sup>

盛成依《府志》認為竹溪寺係鄭省英所建，<sup>45</sup>且建於任府尹之前。因為承天府尹楊朝棟與萬年州守祝敬尚未被成功所殺之前，沈光文恐怕早已耳聞，才會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也就是說，竹溪寺最晚於永曆 15 年 12 月（清順治 18 年，西元 1662 年）以前已經建立。

但問題是：鄭省英的身份既是府尹而非州守，怎會又說是他建竹溪寺呢？這顯然和「州守新構僧舍」一句中的「州守」二字不

<sup>44</sup> 轉引盧嘉興 1977a，頁 9。

<sup>45</sup> 盧嘉興引此說之後，為慎重起見，除了翻閱各府志求證外，由於未找到出處，故又去函請原著盛成教授賜教。文章出刊時，因尚未得到教授的回覆，故另作附記於後。見盧嘉興 1977a，頁 12。又，據楊惠南查證各《府志》的結果，他說：盛文所引《府志》，到底是哪一個版本？並不清楚。台灣志書以《府志》為名者，共纂修五次：（1）高拱乾《臺灣府志》；（2）蔣毓英《臺灣府志》（3）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4）范咸《重修臺灣府志》；（5）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在這五部名為《府志》的文獻當中，都沒有記錄盛文所引的這一傳說。另外，劉壁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以及《清一統志臺灣府》，也沒有提到這一傳說。甚至陳文達《臺灣縣志》、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和王必昌《重修縣志》，也都沒有說到鄭省英創建竹溪寺這件事。參見楊惠南 2002a，頁 105。



合。<sup>46</sup>而且，據現存的史料來說：鄭成功時候的建制是設一府二縣，以府為承天府，縣為天興縣及萬年縣。至永曆 18 年（1664）鄭經（1642-1681）返台，八月始改東都承天府為東寧，改天興、萬年二縣為州。<sup>47</sup>有力的明證是，永曆 18 年改制之後，就完全看不到承天府尹的任何紀錄，這不僅說明承天府作為一個府的建置，在二縣升格為直隸州以後，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原屬承天府所轄四坊，後來都改為「州制」經辦，<sup>48</sup>這更顯示出「州守」之職稱，是永曆 18 年改制之後才有的官職。

此外，對於南溪與新構的僧舍，盛成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南溪即臺南之城南竹溪，新構之寺，即後世之竹溪寺」。<sup>49</sup>文中未見進一步的論證。楊惠南質疑此說法，認為盛文僅從竹溪位於承天府南來論證，並未深入探討「南溪是否就是竹溪？何時改名竹溪？為何改名竹溪？」等這一連串問題的答案，因此，證據和論證過程都顯得極為薄弱。<sup>50</sup>

<sup>46</sup> 楊惠南 2002a，頁 108。

<sup>47</sup> 根據《高纂府志》卷 1〈封城志·沿革〉中云：「成功就臺灣土城居之，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為承天府，總名東都；設府曰承天府，設縣曰天興縣、萬年縣。未幾，成功死。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拒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歸誠。經嗣立，改東都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引見高拱乾 1983，頁 224。其中，將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州的確切年代，據《臺灣外志》與《臺灣史》所說：（永曆十八年）七月，鄭經分配諸鎮荒地，寓兵于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見 1986，頁 224；及林衡道主編 1979，頁 155。或說：「康熙三年（1664）夏四月，經改東都為東寧，升天興、萬年縣為州。」引見沈雲 1995，頁 60。又，「甲辰（康熙三年），三月，……改東都為東寧府，陞天興、萬年二縣為州。」引見川口長孺 1995，頁 54。由上述可知，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州的時間為永曆 18 年（1664），至於月份則有 8 月、4 月或 3 月之說。

<sup>48</sup> 見鄧孔昭 2004，頁 69-77；黃典權 1960，頁 82-84。轉引自唐立宗，頁 2-3。資料來源：「明清教學史料與文獻」網站。

<sup>49</sup> 盧嘉興 1977a，頁 10。

<sup>50</sup> 楊惠南 2002a，頁 108。





綜上所述，盛成為了證明竹溪寺的創建年代是永曆 15 年，所提出的種種論點，幾乎都不能成立。第一，沈詩中所說的「十年」，可能不一定恰為 10 年。而且沈光文入臺的確切年代，至今仍未有定論。因此，如以〈酬唱詩〉中的「十年」恰為永曆 5 至 15 年，而推論出竹溪寺也創建於此時（永曆 15 年），實是值得商榷的。第二，文中引用《臺灣文化志》而說「州」的設立是在鄭成功的時代（即永曆 15 年）。但事實上，《文化志》中並沒有明說縣升格為州的確切年代。改二縣為二州，確切的年代是在永曆 18 年。第三，依《府志》說竹溪寺係鄭省英於永曆 15 年所建。然各《府志》都沒有說到這件事。而且鄭省英的身份是府尹而非州守，這和「州守新構僧舍」一句中的「州守」顯然不合。第四，在沒有相關文獻的證明下，直說「南溪即竹溪；新構之寺，即後世之竹溪寺。」這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第五，以為光文的「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一語，很可能是因已知成功將殺北人楊朝棟與祝敬（時為永曆 15 年 12 月）而說之言。然這也只是猜測罷了。因此，盛成的「永曆十五年」說，是令人質疑的。

#### 四、盧嘉興<sup>51</sup>的論點

繼盛成之後，更為詳盡且全面考究竹溪寺之創建年代的是盧嘉興。不知是否受到盛成的影響，在根本上，盧氏十分肯定沈光文〈酬唱詩〉中所吟詠的對象就是竹溪寺。盧文說，由於當時寺前的清溪位置在承天府（即今臺南市）的南邊，所以稱做南溪，尚未叫做竹溪。如果那個時候已稱做竹溪即沈光文作那首詩的詩題就記竹

<sup>51</sup> 盧嘉興（1918-1992），曾任臺南市文獻委員，用心於文史調查，對於臺南市的文史，貢獻良多。一生著作頗豐，包括專書與單篇論文等，戰後的著作共 147 種。盧氏為臺灣民間文史工作研究者之先驅，撰文嚴謹，講求實證，絕不想像臆測，研究成果廣為日後研究臺南地區文史及古蹟者所引用參考。資料來源：「臺灣大百科全書」網站。





溪了。這條小溪沿畔綠竹成陰，風景宜人，所以於鄭氏降清以前已為騷客稱做竹溪。因是寺名也隨之，自然而然稱做竹溪寺了。<sup>52</sup>

民國 54 年（1965），盧嘉興為文探索臺灣最早興建的寺院時，曾大量的引用盛成的研究成果，如上文之引文。事實上，盧氏也已發現盛文的若干問題，但還是持尊重、保留的態度，進而依據重新查證的史料而加以融通，並結說：

如竹溪寺的興建年代因詩題所記州守與盛成教授的解說有出入時，應興建於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的時候，而落成於改制直後了。<sup>53</sup>所以臺灣最早期興建的寺院為竹溪寺，其次為彌陀寺，再次是龍湖岩。<sup>54</sup>

顯然盧氏已意識到「詩題所記州守」的事實，而州官理應是改制後才有之名，故又重新推算竹溪寺所建年代，說：

以這一首詩的詩題所記的州官是改制後來講，光文於改州的翌（十九）年就因寓諷的詩被讒而逃禪。<sup>55</sup>就這一點來看，這一首詩之作最遲也應在永曆十九年，所以竹溪寺最遲也應在永曆十九年所建。<sup>56</sup>

「逃禪」即出家修行之意。盧氏判定沈光文這首〈酬唱詩〉作於出家之前，亦即永曆 19 年之前，因為「由這一首詩的末句：『僅將心思付禪關』，就可以明白光文作這首詩的時候尚未出家。」所以，

<sup>52</sup> 盧嘉興 1977a，頁 11。

<sup>53</sup> 釋慧嚴亦認同此說而推測竹溪寺乃建於永曆 17 年（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的時候）至 18 年（鄭經改制後不久）之間。見釋慧嚴 1995，頁 284-285。

<sup>54</sup> 盧嘉興 1977a，頁 9。

<sup>55</sup> 盧嘉興接受毛一波的研究成果而認定沈光文出家於永曆 19 年。詳見同上註。

<sup>56</sup> 盧嘉興 1977a，頁 9。



此詩「證明係永曆十九年光文遁入空門前之作無疑了。」<sup>57</sup>光文係永曆 19 年遁入空門，所以竹溪寺最遲也應在永曆 19 年所建。

經過層層論述之後，盧氏於同文最後之「竹溪寺的沿革」開頭即說：「竹溪寺創建於永曆十五年（西元 1661）至十八年間，係由當時的州守所構建。」<sup>58</sup>算是為竹溪寺的創建年代下了一個定論。此說法亦見於松本曉美與謝森集合編的《臺灣懷舊：1895~1945》，書中說：「竹溪寺：築於明朝永曆十五~十八年間（1662~1665），為台灣最早的一座寺院，與開元寺、法華寺、彌陀寺齊名，為台南四大古剎。」<sup>59</sup>這或許是受到盧氏觀點的影響吧！

此後，盧氏又為文撰寫了〈臺灣最早興建的廟寺〉與〈竹溪寺沿革誌要〉等二文，分別刊行於民國 55 年與 65 年。文中，對於竹溪寺的創建年代已有不同的說法，修正了先前的主張。55 年之文稿說：「（竹溪）寺是於（永曆）十八年末或十九年初，由當時的州守所建構落成」。<sup>60</sup>65 年之文稿也說：「（竹溪）寺係在二縣升州之後，沈氏逃禪之前，亦即在（永曆）十八年末，或十九年初所建」。<sup>61</sup>顯然已放棄「永曆 15 年」及「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之時」的論點。

「永曆 15 年」之說是盛成的主張，盧氏於最早論述〈臺灣的第座寺院——竹溪寺〉時，仍保留此說。<sup>62</sup>但隔年乃至 10 年後，就都不再提及，這很可能是未從盛成處得到證實之故。<sup>63</sup>至於先前曾推測竹溪寺興建於「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之時」，在之後的撰述中也

<sup>57</sup> 同上註。

<sup>58</sup> 盧嘉興 1977a，頁 11。

<sup>59</sup> 松本曉美、謝森集合編 1993（2 版），頁 234。

<sup>60</sup> 盧嘉興 1977b，頁 13-14。

<sup>61</sup> 盧嘉興 1977c，頁 1。

<sup>62</sup> 盧嘉興於文後附記云：如《府志》確有記相傳為鄭省英所建，則竹溪寺之創建年代就堪認定為永曆十五年了。見盧嘉興 1977a，頁 12。

<sup>63</sup> 見前註之「盧嘉興引此說之後，為慎重起見……」內容。



都不再提了，其所考量的，或許是因翁天祐的身分不是「州守」吧！

盧氏後來以竹溪寺創建於「永曆 18 年末或 19 年初」為定論，其最主要又最關鍵的理由是：在二縣升州之後，沈氏逃禪之前。由詩題來看，創作時間的確是在改縣為州之後，亦即永曆 18 年 8 月以後。問題是：在之後的什麼時候作此詩呢？為了找到確切的時間，盧氏從詩末的「僅將心思付禪關」一句，解讀為不再關心政治，而推測沈光文在當時尚未出家。加上許多史料都說到沈光文是在得罪鄭經之後，逃入羅漢門山中，出家為僧，<sup>64</sup>時為永曆 19 年。故此〈酬唱詩〉最晚也是創作於永曆 19 年初。

針對盧氏的推論，楊惠南認為這只是盧嘉興的猜測之詞，而且證據顯得極為薄弱，同時，「僅將心思付禪關」之意，也可以理解為：「早已」不再關心政事，「早已」一心皈向於佛（入山為僧）的「事實」。<sup>65</sup>也就是沈光文也可能是在出家後才作此〈酬唱詩〉。

以上的論證，都是建立在一個根本的前提——「所構僧舍就是竹溪寺；南溪就是竹溪」而來。但事實是，沈光文未明說，並且，也缺乏相關文獻可以證明。故盧嘉興的說法，主觀推測的成份比較濃。

因此，楊惠南認為：這首題為〈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的詩作，固然證明了鄭氏王朝的州守，確實曾在承天府內創建佛寺。但是，所說的州守是誰？所建構的佛寺是哪一

<sup>64</sup> 例如，全祖望《鮚埼亭集（卷 27）·沈太僕傳》，即說：已而成功卒，子經嗣，頗有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軍亦日削。公作賦有諷，乃為愛憎所白，幾至不測。公變服為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於羅漢門山中以居。……山旁有目（原註：按原文作曰）加溜灣者，番社也。見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 2000，頁 498-500。

<sup>65</sup> 楊惠南 2002a，頁 102。



座？等等，都是尚待考證的。<sup>66</sup>而且，盧嘉興雖然詳細考證「竹溪」的沿革，<sup>67</sup>但不曾說明（竹溪的前身）蓬溪或溪仔墘溪就是南溪，南溪就是後來的竹溪。在沒有任何文獻證明的情形下，遽然斷言沈光文詩作中的南溪就是竹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今日的日新溪，顯然太過草率。<sup>68</sup>縱使南溪即蓬溪、溪仔墘溪或竹溪，也還是無法證明州守所構的僧舍，就是竹溪寺；因為：

位於承天府南，靠近南溪或蓬溪的，除了竹溪寺之外，還有法華寺。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任臺灣府知府的蔣允焄，在他所撰寫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當中，即說：「城南法華寺前十數武，有地沮洳，廣可數畝。左受蓬溪，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逕新昌里，蜿蜒入海。」足見沈光文所說的州守在南溪所新構的僧舍，也有可能是法華寺。<sup>69</sup>

首先，楊惠南據乾隆年間的〈碑記〉而發現：位於承天府南，靠近南溪或蓬溪的，除了竹溪寺之外，還有法華寺。因此，沈光文所說的州守在南溪所新構的僧舍，也有可能是法華寺。其次，更依高拱乾《臺灣府志》來增進自己的推論，他說：

高拱乾《臺灣府志》，在撰寫夢蝶園主—李茂春時，曾有「構一禪亭，名曰夢蝶處……尋卒，因葬於臺」的句子。「尋」字有迅速、隨即的意思。李茂春死後，夢蝶園雖有

<sup>66</sup> 楊惠南 2002b，頁 7。

<sup>67</sup> 竹溪於乾隆 30 年知府蔣允焄清濬南湖所記的碑記，稱做蓬溪。到了道光年間叫做溪仔墘溪。依照「臺灣採訪冊」記：「溪仔墘溪，源出東門外太爺廊前，南流大橋頭，過竹溪寺邊，轉過曾、蔡二姬崙，旋轉經溪仔墘，西流鹽場，注台江。」又因這條溪流流經鹽埕村落，所以俗稱做鹽埕溪，現稱做日新溪。引見盧嘉興 1977a，頁 11。

<sup>68</sup> 楊惠南 2002a，頁 110。

<sup>69</sup> 同上註。



「僧人鳩眾易以瓦……改名法華寺」的記載，但在李茂春「尋卒」之後，為了方便做為佛寺，州守和僧人合作，在夢蝶園中增構新的僧舍，也未嘗沒有可能。<sup>70</sup>

夢蝶園本是明末隨鄭成功來臺的舉人李茂春隱居之處。由當時的諮議參軍陳永華為之取名曰夢蝶園，該處也住有僧侶。<sup>71</sup>後來才改名為法華寺。楊惠南認為在李茂春「尋卒」之後，當時的僧人為了方便做為佛寺，有可能和州守合作，在夢蝶園中增構新的僧舍。這樣，盧嘉興依據沈光文的詩作所得出的結論，也就不能成立了。因此，楊惠南即依《清一統志臺灣府》與《臺灣名勝舊蹟誌》的說法，將竹溪寺判屬為清領初期所建立的台灣佛寺。<sup>72</sup>

然而，楊惠南在另一篇進一步討論法華寺的相關文章中，說「李茂春逝世後，先是改為準提庵，最後定名為法華寺。」<sup>73</sup>並且接受盧嘉興〈夢蝶園改稱法華寺年代考〉之研究：改夢蝶園為法華寺者不是蔣毓英知府。<sup>74</sup>其次，又引宋永清（康熙 47 年，鳳山知縣）的〈火神廟記〉，<sup>75</sup>而說：「從『顏其寺曰法華』一語的語氣看來，法華寺一名似乎始自宋永清，時間則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sup>76</sup>

<sup>70</sup> 同上註。

<sup>71</sup> 釋慧嚴 1995，頁 311-312。

<sup>72</sup> 楊惠南 2002b，頁 18。

<sup>73</sup> 楊惠南 2002b，頁 14。

<sup>74</sup> 盧嘉興 1979b，頁 321-327。

<sup>75</sup> 宋永清〈火神廟記〉曰：「嘗稽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水。炎帝以火紀官，而為火師。陶唐氏有火正，曰祝融。《周禮》：『夏官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災。』故凡州邑，皆置神而崇祀焉。予宰斯土，見祭燿之義闕焉不講，而居民廬舍時或遭回祿者，毋亦出納之違時，抑亦所以祀之者未有寧宇也？因與同寅李諸羅，集諸衿，捐俸樂輸；有不足者，一一肩之。擇爽塲於府治東南僧舍，易其制而高大之。因以磚瓦，施以丹漆，命工尚像而致時享。中堂祀大士，後院泊兩傍構列禪室。繞以竹木，間以花果。背山面流，巍煥幽深，亦招提一大也！因顏其寺曰『法華』，仍令僧徹空主之。」見周元文 1983，頁 377-378。

<sup>76</sup> 楊惠南 2002b，頁 19。



意謂夢蝶園是在康熙 47 年，由宋永清在新建寺前殿的火神廟後，命名為法華寺。至於何時改為準提庵，文中並無論述。據釋慧嚴的研判，住在夢蝶園的僧侶們，是在康熙 23 年蔣毓英知府的時代，整修夢蝶園，並將茅草屋改以陶瓦重建，時因內奉準提菩薩，遂易名為「準提庵」。<sup>77</sup>由此可知，原先的夢蝶園，在李茂春死後，僧人是在康熙 23 年進行整修、改建；而正式改名為法華寺是於康熙 47 年。這些都是隸清之後的事。此時，已不再有「州守」之職稱；<sup>78</sup>而且「僧人鳩眾易以瓦」比較是將老舊的建築再翻新，故應有別於「沿溪傍水便開山」而「新構僧舍」之意。

是故，筆者以為，如果南溪就是蓬溪、溪仔墘溪或竹溪，那麼，沈光文所說的，位於承天府南，靠近南溪或蓬溪，由州守所新構的寺院應就是竹溪寺！這是一點。另外，若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的「南溪」也可以不必是溪的名字。當時那條溪或許還未取名，因其位於承天府南，故沈光文的詩題只是單純的說明那由州守所新構的僧舍，是位於承天府南的清溪旁。

## 五、結論

綜合以上依史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一一考察的結果，筆者認為：位於臺南府城的古剎竹溪寺，其寺名早已見於現存可徵的康熙 33 年之史料中，此中又記臺灣知府吳國柱於康熙 32 年附建竹溪書院於這個寺院，顯然竹溪寺的存在至少也早於康熙 32 年。而且，如果竹溪寺是開創於清代，則各志書的說法也不會有太大的出入才是，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故可推知竹溪寺應是建於清領之前。

<sup>77</sup> 釋慧嚴 1995，頁 304-312。

<sup>78</sup> 康熙 22 年，清朝治臺之始即廢天興、萬年二州：「本朝康熙元年，鄭成功置萬年縣、天興縣。鄭經升為州。二十二年廢。」引見穆彰阿 2007，頁 69-70。



至於兩部最早提及竹溪寺卻未記明建築年代的臺灣志書——《高纂府志》與《王纂縣志》，其所以未記建立的年代，極大的可能就如盧嘉興所推測的：「未記明創建年代，則係建自明鄭時期，以致修志時已無法查考」。<sup>79</sup>或許正是因為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考」之故，但也更或許是政治因素使然，而「出於不便記明所致」，<sup>80</sup>使得早期纂修的志書，凡清領後所建之寺皆有記明創建年代，唯竹溪寺（與彌陀寺）未記明。<sup>81</sup>而更早修纂的《蔣纂府志》所以尚無竹溪寺等之記，其最主要的原因更可能就是「出於不便記明所致」。這如連雅堂在《臺灣通史》的自序中所說：「舊志誤謬，文采不彰，其所記載，僅隸有清一朝，荷人、鄭氏之事闕而弗錄，竟以島夷海寇視之」。<sup>82</sup>

依連雅堂的看法，臺灣的舊志除了有誤記的情形外，還有一個缺憾就是，所記載的內容只有隸清之後的最為詳盡，至於先前耕耘過臺灣的荷蘭人及鄭氏王朝，因視之為「島夷海寇」，故有關於清領之前的種種則「闕而弗錄」。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使得最早纂修的第一部志書，未收錄竹溪寺（乃至彌陀寺等）。若是如此，則也意味著竹溪寺（與彌陀寺）是明鄭時期所建的寺院。

至於確切的建寺年代，盛成與盧嘉興都曾有過一番的研判。盛

<sup>79</sup> 盧嘉興 1977a，頁 8。

<sup>80</sup> 同上註。

<sup>81</sup> 盧嘉興撰文的那個時代，臺灣還在戒嚴時期，所以他在文章的表達上，感覺是有點保守的。在《高纂府志》與《臺灣縣志》中，明明已經有了竹溪寺與彌陀寺之記，但為何卻都只有寺名而沒有創建的年代？照理來說，時間並沒有很久，應該不會沒有記載才是。而這可說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特色，就是當權者對前一朝的否定，亦即滿清絕對不承認明鄭時期的政權。所以對明鄭政權的所有的東西，可能有些地方會被忽視，甚至漠視。因此不相信它無法查考，而很可能是盧嘉興當時，在表達上有點保留故。此一觀點乃由釋慧嚴教授在研討會上所提出，筆者有所受教，並且感謝教授的指正。

<sup>82</sup> 連雅堂 1985，頁 15。



成依沈光文的〈酬唱詩〉首先研判竹溪寺建於永曆 15 年。盧嘉興則以竹溪寺創建於「永曆十八年末或十九年初」為定論。他們的取決標準，皆依沈光文的〈酬唱詩〉，<sup>83</sup>一致認為「南溪」即竹溪，所新構的「僧舍」即竹溪寺。二文的差異處在於：前者依「十年」、「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說，而判此詩作於永曆 15 年，竹溪寺之構成亦於此時。後者著墨於「僅將心思付禪關」一句，認為此詩作時沈光文尚未出家，故是永曆 18 年改制後，永曆 19 年出家之前所作，竹溪寺即為此期間所建。

二者的說法各有其理，但因所重不同，故得出的結論也有別。而根本的問題是，沈光文的〈酬唱詩〉並未明說「南溪」就是竹溪，所新構的「僧舍」就是竹溪寺。盛文對此未作進一步的證實，而盧嘉興雖有立論但證據很薄弱，所以也會相對地影響研究成果的可信度。

筆者認為，沈光文詩題〈州守新構僧舍於南溪〉的「南溪」，或許只是單純的意指位於承天府南邊的清溪。在這一條溪畔所建的佛寺，雖有法華寺與竹溪寺，但因夢蝶園（法華寺的前身）的重建是在隸清以後，而且性質別於「開山」，所以，在鄭經時期由州守所構的新僧舍，應該就是竹溪寺！此外，在臺灣府海防同知齊體物<sup>84</sup>所作的〈竹溪寺〉<sup>85</sup>一詩中，其最末一句的「須知司馬是閒官」似也暗示著該寺為官員所建。若與沈光文之「酬唱詩」對照來看，則可推知：竹溪寺是鄭氏王朝的州官所構作。

<sup>83</sup> 毛一波認為此詩「當為（鄭）經主台時之作」。見龔顯宗主編 1998，頁 187。

<sup>84</sup> 齊體物，正黃旗人，丙辰進士，康熙 30 年任第 2 任臺灣同知。見高拱乾 1983，頁 58。

<sup>85</sup> 詩云：「梵宮偏得占名山，岫作蠻州第一觀。潤引遠泉穿竹響，鶴朝朝磬候僧餐。夜深佛火搖鮫室，雨裡檳榔綴法壇。不是許珣多愛寺，須知司馬是閒官。」此詩收錄於康熙 33 年之《高纂府志》中，是為各篇文獻可稽之史料當中，最早的竹溪寺相關詩作。同上註，頁 279。





當時，因其「寺傍山崖，清溪秀谷，茂林修竹，而有『竹溪寺』之名。又因景色絕美，令人恍如置身西天，所以又名『小西天寺』」。<sup>86</sup>《舊蹟誌》也說：「小丘立於旁，一水流於前，綠竹四邊繞，此是竹溪寺命名之原因」。<sup>87</sup>鄭經改制是在永曆 18 年 8 月（或說 3 月或 4 月），因此竹溪寺開始動土興建最早也應在 18 年末。

若沈光文所說的「十年作客幾能閒」之「十年」不必正好 10 年而是意指 10 年左右，又因其入臺的時間至今仍未有定論，故亦無法依之推得此詩創作的確切時間。但依〈酬唱詩〉中所透露的：此時的政事很多，但他已不再關心，<sup>88</sup>早已一心皈向於佛，故云「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又，由於詩題說是〈人多往遊，余未及也〉，表示當時寺已建好，因景致殊勝而常吸引人們前去賞遊；而沈光文自己呢？筆者以為：他很可能因為以賦寓諷鄭經<sup>89</sup>而受讒，幾至不測，乃變服入山為僧，於「目加溜灣番社（即今台南縣善化鎮，為當時的承天府之北）傍教授生徒，兼以醫藥濟人」。<sup>90</sup>故不便前去新構的僧舍賞遊。因此，沈光文作此詩時，竹溪寺已落成；而該詩之創作則最早也應在永曆 17 年作《臺灣賦》之後不久，卻因寓諷被讒而變服為僧以後了。

<sup>86</sup> 松本曉美、謝森集合編 1993（2 版），頁 234。

<sup>87</sup> 原文：「小丘傍らに起り、一水前を流れ、綠竹四邊を繞る。竹溪の寺名わる所以なり」。見杉山靖憲 1916，頁 138。在研討會上，釋慧嚴教授重譯為：「小丘立於旁，一水流於前，綠竹繞四邊，所以名為竹溪寺」。

<sup>88</sup> 按：永曆 17 年成功卒，子經嗣，頗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永曆 18 年，經因反清失敗而退守臺灣，很想有一番作為。沈光文或許是因不滿鄭經的作為，故政事雖多卻不再關心。

<sup>89</sup> 永曆 17 年（1663 年），沈光文作《臺灣賦》，對鄭經有極為嚴厲的批判；例如：「壬寅年（即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 年）物故，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諂媚，逢迎者事盡更張。般樂之事日萌，奢侈之情無饜，橫征費，割肉醫瘡，峻法嚴刑，壅川弭謗。主計者所用非所養矣，所養非所用矣。世風日下，人事潛移。……」龔顯宗主編 1998，頁 164-175。

<sup>90</sup> 蔣毓英 2004，頁 254。



綜合以上的討論，筆者初步得到的結論是：竹溪寺乃創建於明鄭時期，而且就在永曆 18 年改制後之鄭經主臺初期的可能性很高，並不是如較晚的史料所記與楊惠南所判定的，歸屬隸清以後所建之寺院。至於其是否為全臺首座的佛刹，則留待日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 參考文獻

- 川口長孺。1995。《臺灣鄭氏紀事》。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王必昌。2005。《重修臺灣縣志》。臺北：文建會。
- 王禮。1983。《臺灣省臺灣縣志》。臺北：成文。
- 全祖望。2000。《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江日昇。1986。《臺灣外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余文儀。2007。《續修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
- 杉山靖憲。1916。《臺灣名勝舊蹟誌》。臺灣總督府。
- 沈雲。1995。《臺灣鄭氏始末》。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周元文。1983。《重修臺灣府志》。臺北：成文。
- 林熊祥主修，李添春纂修。1956。《臺灣省通志稿》。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林衡道主編。1979（再版）。《臺灣史》。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松本曉美、謝森集合編。1993（2版）。《臺灣懷舊：1895~1945》。臺北：創意力文化。
- 范咸。2005。《重修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
- 高拱乾。1983。《臺灣府志》。臺北：成文。
- 連雅堂。1985。《臺灣通史》。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
- 黃典權。1977。《臺灣南部碑文集成》（上）。臺灣大通書局。
- 楊惠南。2002a。〈竹溪寺創建年代的待商榷〉。《臺灣文獻》，第 53 卷，第 2 期。頁 99-112。



- 。2002b。〈明鄭時期臺灣「名士佛教」的特質分析〉。《臺灣文獻》，第 53 卷，第 3 期，頁 1-38。
- 蔣毓英。2004。《臺灣府志》。臺北：文建會。
- 盧嘉興。1971。〈再談臺南古剎彌陀寺〉。《古今談》，第 78 期，頁 38-40。
- 。1977a。〈臺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竹溪禪寺沿革志》，頁 7-12。臺南：竹溪寺。
- 。1977b。〈臺灣最早興建的廟寺〉。《竹溪禪寺沿革志》，頁 13-14。臺南：竹溪寺。
- 。1977c。〈竹溪寺沿革誌要〉。《竹溪禪寺沿革志》，頁 1-5。臺南：竹溪寺。
- 。1979a。〈臺南古剎彌陀寺〉。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頁 255-267。臺北：大乘文化。
- 。1979b。〈夢蝶園改稱法華寺年代考〉。張曼濤主編。《中國佛教史論集》，頁 321-327。臺北：大乘文化。
- 穆彰阿。2007。《清一統志臺灣府》。臺北：文建會。
- 釋慧嚴。1995。〈臺灣佛教史前期〉。《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頁 273-314。
- 龔顯宗主編。1998。《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 明清教學史料與文獻。  
<http://www2.scu.edu.tw/history/PDF/report2006TangLZ.pdf>。
- 盛成——互動百科。  
<http://www.baik.com/wiki/%E7%9B%9B%E6%88%90>。
- 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9137>。

儀徵風情。 <http://www.0514.net/shengsheng/faguo.shtml>；

<http://www.0514.net/shengsheng/zhuanlue.shtml>。



#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ounding Year of Tainan's Zhuxi Temple**

Tzu-Hsien Shih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 **Abstract**

Scholars mostly make use of research findings of Lu Jia-Xing to claim Zhuxi Temple, Mituo Temple and Longhu Temple as Taiwan's earliest Buddhist temples. Some people even refer to the founding year of the first two temples to define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Buddhism on the island.

However, it is not really known when Zhuxi Temple was first built. Some people claim it was from the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sources from later periods. Some others, like Lu Jia-Xing, claim the temple was built during the Ming-Zheng era, and even suggest that it was Taiwan's first Buddhist monastery. Such an argument is based on Sheng Cheng's studies, and especially on Shen Guang-Wen's verses, the founder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But Yang Hui-Nan takes a new survey on Lu Jia-Xing's comments, and thinks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need more



discussion, moreover, some major arguments are simply not tenable. After almost half a century's historical study of Taiwan's Buddhism, if Yang's conclusion is justified, it may exert some influence over previous research. I believe there is a need for further clarification, and thus bring forth the present paper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Buddhism in Taiwan.

The article first reviews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 relating to Zhuxi Temple, trying to trace its origins. Then, it examines respectively viewpoints of Sheng Cheng and Lu Jia-Xing, before analyzing arguments made by Yang Hui-Nan.

After exploring archival data and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draws a preliminary conclusion that Zhuxi Temple was founded during the Ming-Cheng reign, and most likely after Zheng Jing retreated back to Taiwan in the 18<sup>th</sup> year of the Yongli reign. It differs from Yang's judgment and later historical materials, advocating the temple appeared after Taiwan being integrated into the Qing dynasty. Regardless whether the temple might or might not be the oldest in Taiwan, the issue certainly needs further study.

**Keywords:** Zhuxi Temple, Mituo Temple, Fahua Temple, Shen Guang-Wen, Exchanging Poem

